

法兰克福学派的非经济分析及其借鉴： 分配、分化和认同

舒展, 杨秋乐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我国在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后, 目前正处于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高发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阶层分化的批判理论, 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来看, 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 恰是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必须看到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事实, 即市场经济会导致阶层分化, 但导致我国阶层分化且可能滑向阶层对抗险境的根源不在市场经济本身, 而在于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二是主体感受, 即缘于经济体制的财富分配不合理这一客观事实, 同时掺杂着公民政治权利和身份认同的巨大落差而产生的主体感受。权利不公平感强化了阶层的对立情绪, 而二元身份认同习惯挤压了人的心理承受力, 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认同感低于事实上的经济收入和地位。在阶层分化背景下, 与经济社会地位多元化相适应的多元身份认同, 是调适社会群体心理失衡的诉求, 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阶层分化; 收入分配; 非经济分析;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46(2012)06-0031-05

我国目前正处于传统(阶级)社会向现代(认同感)社会转化的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 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文化观念等产生了客观差别, 出现了阶层分化。阶层分化本非坏事, 但要保证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 承认差别, 促进阶层流动, 形成良性顺畅的向上流动机制。如何消解阶级意识、避免阶层对抗、促进阶层流动, 维护社会稳定, 是研究和解决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民生问题必须首先要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 鉴于我国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 对比欧美国家的现代(认同感)社会, 会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阶层分化和社会主义战略的批判理论, 值得我们思考, 抛开制度和意识

形态因素, 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消解

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 阶级意识和阶级对抗是核心内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阶级作了如下的著名定义: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 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1]693}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阶级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经济条件把大批的居民转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

收稿日期: 2012-10-08

作者简介: 舒展(1967—), 女, 浙江兰溪人,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1]159}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仅人数增加,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也会趋同,从而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最后全世界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逐渐统一,形成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就连在一国国内发展阶级意识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并且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实施福利政策,工人阶级日趋多层次化,出现阶级(意识)消解的现象。

梳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展史和现状,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阶级意识被分割,工人阶级内部结构高度分层化。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部门和行业差别,造成工人阶级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这些差别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利益的高度分化。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领域所作的某些调整诸如大力推广福利政策、吸收工人参与管理等,缓和了社会和阶级矛盾,出现了数量日益扩大的阶级界限模糊的中产阶级。在美国中间阶层约占家庭总数的60.7%,大富豪、大资本家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2]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给统一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增添了难度。

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保证了阶层的流动性。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机会,而且通过推动社会良好的技术创新能力,新产品、新技术、新生产方法等层出不穷,使经济体对技术工人保持着旺盛的需求,从而较好地保证了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就业机会多、对社会成员的开放性好,工人从较低的阶层往较高的阶层爬升、迁跃的机会增多。阶层与阶层之间处在不断的流动之中,没有阶层的断裂、隔绝,就不会有阶层的固化和阶层之间的对立。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一书中认

为,与欧洲相比,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说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更好,这是美国工人更多倾向于“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振的原因之一。^[2]当然阶层流动性好,并不排除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也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本质。

第三,工人阶级运动从阶级斗争转向民主政治斗争,国家统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英国工会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就已合法化,国家不再动用军队来镇压国内政治活动,警察处理抗议活动的方法趋于成熟,工人有选举权,可以利用英国两党政治为自己谋取利益。可以说,英国阶级属性模糊的政党和非军事化的政府化解了阶级斗争问题。再比如,美国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已经有了民主政治和没有阶级阵线的政党。美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活动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选择性镇压,即专门镇压由共产党或大工业工会组织和领导的罢工或其它政治活动,而不镇压合法的由行业工会组织的以经济为中心目标的罢工。美国政府的这种镇压方式迫使工人运动向政府允许的渠道,即行业工会的道路发展。

从以上三种现象可以得出的直观认识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稳定,很难出现阶级对抗形式的社会冲突,其原因不仅仅是以往我们分析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生产关系、实行福利政策、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等等的结果;还包括生产力发展客观形成的良好的阶层流动机制;以及包括多元文化主义所培育的宽容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削弱了阶级对立意识的结果。

从2011年发生在美国华尔街后又影响多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可以读到这些信息。这场声势浩大时间持久的“占领”运动,明确反对99%的平民百姓与1%的富豪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但它只是一场自发的群众性社会运动,而不是阶级斗争。虽然有教师工会、交通工会等各工会组织的身影,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和严明的组织和领导,因而反而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竞选中可以利用的棋子。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非经济分析及其方案

对此,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了种种学理上的解释。他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高估了工人的革命

性。一个国家中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而成的。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着“话语霸权”(葛兰西, Gramsci 1929),给工人们灌输了“虚假意识”(卢卡奇, Lukacs 1923)和“顺从意识形态”(帕金, Parkin 1968),这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设立了根本性的障碍。

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借助社会学和心理学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结构矛盾和危机进行了非经济的、人本主义的分析,建立了 20 世纪著名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使经济活动的政治本质日益公开化,国家干预增长的后果之一是阶级政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民主政治观念,虽然阶级冲突和剥削仍然具有基础性价值,但它们被用来表述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不仅仅是阶级的不稳定(Habermas J.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 Heinemann, 1976, p165.)

冷战结束后,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甚至进入“沉寂”期,被某些学者称为“后社会主义状况”,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分裂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突破和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后社会主义”理论,针对西方社会阶层分化和阶级消解的状况,指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和制度改革实践的崛起,各种类型的个体和团体在要求平等对待这一基础上,其正义要求既包括经济上要求再分配,也包括文化诉求上的身份认同。

南茜·弗雷泽看到,1990 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正由阶级斗争转向身份承认,“最突出的社会运动不再是被界定为经济上的‘阶级’为捍卫自己的‘利益’、结束‘剥削’、赢得‘再分配’而斗争。相反,这些运动被界定为文化上的‘群体’或‘价值共同体’,他们为捍卫自己的‘身份’、结束‘文化统治’、赢得‘承认’而斗争。”(Nancy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Routledge, 1997, p2)所谓“承认(recognition)”,其基本含义

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南茜·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我们置于这样一种社会形成中,将之区分为专门的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事实上当代社会是经济、文化和政治不正义的盘根交织,我们不应该期望改变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本身将克服分配不公,也不应期望改变物质分配的经济机制本身将克服制度性的错误承认。^[3]她提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加“政治上的代表权”的新社会主义战略。^[4]她认为“承认”(认同)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差异族群争取平等身份的文化斗争在当代已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经济不平等在增长,分配正义问题同样不可漠视。因此,当今阶层分化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表现为:为分配而斗争和为承认而斗争两组关系,这是当今正义诉求的两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盛行,常常被认为会挑战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并造成社会的分裂与动荡。然而,事实证明,由多元文化主义所培育出的宽容开放的政治文化氛围,非但不会成为凝聚人们爱国力量的障碍和阻力,反而会加强人们的认同感,尤其是对政治文化的认同。^[5]

南茜·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及其正义理论框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提醒我们重视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及其解决方式。我国在经历 30 年的改革开放后,目前正处于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高发期。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所面对的现代化悖论和相应境遇有相似之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存在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发展社会和谐,用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诉求。以南茜·弗雷泽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倡导的正义理念,对于我们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关系的平等和谐,将起到积极的启示作用。

三、我国当前的阶层分化和阶级意识发展现状及对策

从政治制度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经进入人民社会,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来看,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恰是国内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

1. 客观事实:市场经济会导致阶层分化,但导致我国阶层分化且可能滑向阶层对抗险境的根源不在市场经济本身,而在于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1 年 12 月 11 日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解放初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经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根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可把他们分成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型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在强弱阶层中急剧断裂,造成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且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 0.24 到 0.36 之间,而中国 2009 年的基尼系数达 0.47,在所公布的 135 个国家中名列第 36 位,这就意味着全部财富分配当中 47% 是不均衡分配。新华社和中国经济网 2010 年 5 月 10 日报道:“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 3.3 倍,国际上最高在 2 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 15 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 18 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 128 倍。”

市场经济会造成阶层分化,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但奉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没有那么多高,这是福利政策、政府干预的结果,也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反对政府干预、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美国基尼

系数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导致我国基尼系数偏高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改革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导致我国目前两极分化的充分条件,而分配不公是导致两极分化的必要条件。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财富的重新分配一直处于不稳定、非均衡、非制度化状态,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双轨制”到 90 年代的国企改革,以及房改、教改、医改,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合理地将利益地方化、利益部门化,使社会资源的分配有失公正,使本该由更多人分享的成果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核心原因。

市场机制会导致阶层分化,改革过程的财富分配不合理也会导致阶层分化,这两种情形伴随着改革过程,交织在一起。在不完善的经济法规和公共服务体系下,代表社会公平公正的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再分配原则,对于消除阶层对抗、促进阶层流动,调节效果甚微。从 1997 年到 2007 年,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重从 53.4% 下降到 4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6]

值得关注的是,缘于经济体制的财富分配不合理这一客观事实,同时参杂着公民政治权利和身份认同的巨大落差而产生的主体感受。

2. 主体感受:首先权利不公平感强化了阶层的对立情绪,其次二元身份认同习惯挤压了人的心理承受力,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认同感低于事实上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30 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人们关注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始终是当下的境遇;不是历史纵向轴上的生活水平提高,而是政治权利和身份认同的落差折射出的主体感受。

根据国际比较,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的情况。“中层”认同群体的比重,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认为:“2008 年的调查显示,我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还不到 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占了将近 55%,全世界都没有像我国这样的调查结果。”^[7]他认为这种认同偏差的存在,给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添了难度。

众所周知,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是“橄榄形”结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是社会稳定

和发展的中流砥柱。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存在着认同困境。一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隧道效应”逐渐消失(“隧道效应”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大小的一种假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将此概念引入发展经济学,用于解释收入差距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二是中产阶层显露出真实的脆弱性,居高不下的房价、教育及医疗领域不菲的费用,再加上物价压力等诸多原因,导致中产阶层缺少一定的稳固性。这样的现实,与底层向上流通的渠道存在“肠梗阻”结合在一起,使得不少中产者缺少足够的乐观。

从政治权利看。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其经济要求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包括个人作为社会劳动者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权利,如就业、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权利。它涉及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是最具体、最普遍、最能直观感受到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恰恰是这些反映民生的基本政治权利,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相应建立和完善起来。在竞争激烈高风险的市场环境中,作为社会劳动者缺乏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竞争环境,又缺乏必要的保障救助的社会环境,边缘化的处境、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难免低于实际所处的水平和状况。

从身份认同看。在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方式改变的同时,人们的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经济收入水平分层,身份形态也出现多元化倾向。但是,受历史和现实国情的影响,多元的经济收入分层并没有带来多元的身份认同,整个社会仍处在二元认同时代:非贫即富、非善即恶、非公即私,非好即坏,非成功即失败。但什么是成功,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房子、票子,目标物质化、能力金钱化。这种阶层多元化与二元身份认同的挤压效应,使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公平现象被非理性地强化。

社会底层的主体感受,会强化阶层对立情绪,是促使阶层分化—阶层固化—阶级分化—阶级对抗等一系列转化的催化剂。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长期以来,我们从主客体对立关系的认识论出发,强调以经济手段为根本,通过生产力的发展

来解决民生问题。随着全球性资源环境问题和国内社会问题的出现,发现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缺失了主体间性这一环,即主体的本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感受,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经济建设是直接手段,而政治建设是稳固前提,文化建设是长远保障。亚里斯多德说:人性要发展,就应该能够说话。表达和承认,是民主和文化的核心问题。

因此,改变这种社会状况既需要从经济体制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建设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政治体制上完善法律程序,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综合公平体系;同时,还要在文化体制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同时,尊重主体感受的多元化及其认同需求。这是坚持“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文化自觉和自信力的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固然是倡导的主流,在阶层分化背景下,与经济社会地位多元化相适应的多元身份认同,是调适社会群体心理失衡的诉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93.
- [2] 赵鼎新. 民粹政治:中国冲突性政治的走向[J]. 领导者,2008(2):123-133.
- [3] 周穗明.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战略的新演进[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8(12):58-70.
- [4] 南茜·弗雷泽. 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Z]. 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Routledge, 1997:2.
- [5] 黄璇、任剑涛. 论多元文化主义对政治文化认同的强化——以美国社会为例[J]. 太平洋学报,2010(3):29-37.
- [6] 马广海. 存在、认同与冲突:转型期我国社会的阶层意识概览[J]. 山东社会科学,2011(5):66-74.
- [7] 李培林. “阶层认同偏下”与社会建设滞后[N]. 第一财经日报,2012-06-26(A7).

(责任编辑:陈东林 校对:张叔宁)

(下转第64页)

Poet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Critique

—A Case Study: *The Soul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by Dickenson

SUN Youp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167*)

Abstract: Poetry translation focuses on presenting the poetic rhythm and imagery of the source poem, i. e. poetic and pictorial splendor. Translation critique emphasizes the degrees of form – image – meaning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ranslated versions. In a simple daily language, wild imagination and powerful creation, Emily Dickinson's poem No. 303 (a three – scene Soul drama) portrays the Soul that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in three stanzas. Her new ideas are expressed with abnormally brand new symbolic forms and poetic skills, such as phrases, capitalized nouns, and dashes, to display profound insights, and choices tailor – made for the Soul. A comparison of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dicates that effective poetry translation seeks faithfulness and equivalence in style. Several later translations demonstrate a dynamic translation process in which translators approach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writer until finally become invisible. A successful translation is one that goes beyond metaphors and reveals the poet's spiritual world and writing style.

Key words: poetry translation; critique; imagery; metaphor

(上接第 35 页)

A Non – economic Analysis from the Frankfurt School Viewpoint and its Significance: Distribu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Identity

SHU Zhan, YANG Qiul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After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our country is now in a period of high incidence of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in Western Marxism concerning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has a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in the reformation of current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With regards of people's social status and income, the process of market – oriented socialist economic reform coincides with the process of domestic socia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Two aspects are especially worth our attention; one is the objective fact that market economy is bound to cause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though the fundamental causes lie not in the market economy itself, but in the ir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roughout the reform process, which may convert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nto stratum confrontation. The other is the subjective emotion,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objective fact of ir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an economic system, and which is mixed up with the huge emotional gulf in civil political rights and status identities. The feeling of unfair rights strengthens stratum confrontation, and the habit of binary status identity further squeezes people's psychological endurance, which results in people's lower identity of their actu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of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a multiple status identity, adapted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diversification, is the requirement for adjusting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between social communitie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stratum differenti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non – economic analysis; cultural identity